

三江论坛：“上善若水，水利万物不争”，宁波沦为浙江“老二”，其实没啥不好……

车弓

1、有朋友转来一条“为何宁波近些年沦为浙江老二”的微信，说是似曾相识。我知他这般说，是指去年春季我发过一条微信，内容也是关于这方面的，内中诸多观点颇为相似。

为何近些年宁波沦为浙江老二？其实并不奇怪。如果我说宁波本身就是浙江“老二”，可能会被一些激进的“爱城者”辱骂？然而，事实原本如此，从历史角度说，相对浙江省会城市“六朝古都”杭州来说，宁波从来就居“老二”；如果历史再往前提及一些，可能连“老二”都没有，在句践立国的春秋时代，城市“老大”应是绍兴的会稽城，那时地处海隅的宁波，连一个像样的城廓都没有。句章港或说句章城，能和“大禹治水三过家门不入”的会稽比吗？当然，那时的“临安”（杭州），也就没法与会稽比。那时不统计GDP，我无法确切地说出宁波处现浙江境内的“老几”，估计连“老三”、“老四”都保不住。因为在农耕文明的“黄金时代”，地处海隅的宁波：“七山二水一分田”，土地资源明显地不足。如果你了解这段历史，就会明白在唐、宋间，凡是在宁波履职有作为的官员，都是疏浚河道、修缮海塘，为的就是增加宁波的耕地面积，使人们过上好的日子。现在我们翻开乡土历史，就会看到“它山堰”、“谢公塘”、“施氏堤”等一系列的水利设施，说穿了就是“为民造福”、去争浙江省内GDP“老二”的

因此，城市的发展和兴起，不能只看一时一举，有关部门的数字统计、房地产的增速、或是几个华而不实的文人喊喊空头口号而见端倪的；衡量一个城市的发展和进步，因素是多重和复杂的，需要从历史角度，市民对城市居住的幸福度，和工商、基础设施和文化成因布局及前景，进行客观分析和有效促进之。改革开放前几年，宁波依赖得天独厚的北仑大港和走南闯北的“宁波帮”，GDP发展远跑在省会城市杭州前头，应该说这是好事。现在改革开放四十年过去，原本基础就不错的杭州，应该也是好事，而且是很自然的好事。我们应该为之高兴，而不应该酸溜溜地说些风凉话。我之所以会在去年春，写一篇“近些年宁波为何发展滞后”的小文，主要是站在历史文化角度，对宁波“盲目自大”、“贪大求洋”，一些不切实际的口号与做法不满，向一些还在台上呼风唤雨的朋友敲个警钟。什么“书藏古今、港通天下”、“天下旅游、××开游”、“东亚文化之都”、“中国慈孝之城”、“中国智慧城市”、“宜居城市”……而在这些口号下，盲目的得意与泄劲，“假大空”的项目投入与建设，不仅不符合历史上宁波人“埋头实干、不事张扬”的个性；而且阻碍了城市优秀传统文化精神的实施和传承，继而影响城市

自身发展的进度和品质……

真正的经济和文化意义上的城市“老大”，是党和政府带领全城百姓，一砖一瓦干出来的，而不是仅仅“口号”而已。

2、在城市学意义来说，城市建设是在政治经济、文化社会综合前提下发展的。其经济是基础，文化是内涵。不能仅凭经济 GDP 而论城市兴衰。我这般说并不为否认宁波在浙江“老二”的地位，恰恰相反，就是在宁波 GDP 超过杭州时，我也认为宁波在浙江是次于杭州的“老二”；因为由于历史原因，杭州在浙江城市中一直处于“老大”（特别是文化老大）的地位。三十年前宁波的经济总产值超越杭州，除了上述所说北仑大码头和“宁波帮”因素外，主要还由于享受中央计划单列市的政策，这也是一个地域经济起飞的重要条件，至于近年国内排行的“中心城市”和“次中心”，青岛、苏州和厦门排在宁波前面去了，至于深圳，更是远远地排在前面。其实这也不用奇怪，深圳的发展是由多方面因素组成的，有着宁波许多无法比拟的因素和地域条件。世界上许多经济 GDP 上升的城市，除了政府或说政策的作用外，主要还是地理位置的原因，如厦门的经济 GDP，相对就没有宁波高……

我这段时期一直在读吴敬琏先生《改革，我们正在过大关》这本书。此书出版于 2001 年，是该年全国社科类优秀畅销书，2002 年又一次强力推出，原因是此书主要论证的是中央推行的政策、资源和地域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；也就是同样的政策，同样的资源，同样的勤劳，为何有些地域的经济企业如雨后春笋般的发展了，而有些地域却停滞不前……

这就关系到人们的思想动机（更深一步说是地域文化成因），起了决定与关键的作用。我办理退休后集中精力，写了一部题为《太阳正在升起》近百万言的长篇，主旨就是表现当代农民在改革开放年代由“牛”抬头转化为“人”的故事。我想说明什么？是文化，是这座城市拥有和蕴藏的“源文化”，或定义为“根文化”，促使人们思想转变，在同等的条件比别人先迈出了一步……

宁波在改革开放的四十年间，也曾有过在别人眼里“老大”的岁月。那是在改革开放的头十几年，也就是我刚才说的由于北仑大港的开发和走南闯北的“宁波帮”孕育“新宁波帮”——乡镇（民营）企业的兴起，造成地域经济 GDP（那时还没做为唯一标准）飞速增长，领先浙江和东南沿海若干年。这里面值得分析的是不仅是北仑大港，那是中央政策和宁波地理位置决定的，主要还是宁波“走遍千山万水、叩响千家万户、说尽千言万语”，如雨后春笋般兴起、有“新宁波帮”之称的乡镇、民营企业。记得二十年前统计全国“百强县（市）”，只有六个县（市）的大宁波，就有鄞县（现鄞州区）慈溪、余姚入选，而且排名靠前（鄞

县、慈溪市在十名内)。笔者当年采访近百名鄞县、慈溪、余姚的乡镇、民营企业家，没一家不为地方政府做出杰出(重要)贡献的。当年慈溪的乡镇、民营企业突破万家，不到30万本地农民劳力，近10万外出筹办企业，另20万雇佣了百万(最多时达150万)外地农民，为这个新兴的县级市“增砖添瓦”……

这些，就是在“太阳升起”时，为改变自己世代为“牛”命运的新型农民，“集体抬头”转化为人的过程。没有党的改革开放政策，就没有他们的今天。而那时候承负着国企“攻坚”重任的杭州市，还被有“暴发户”之称的宁波人讥笑为：“美丽的西湖，破旧的街市”的叹息中，唯一繁华的一条解放街和新开发的“四季青”商摊，柜台上流行的不过是“温州的皮鞋、义乌的小商品和阿拉宁波杉杉、雅戈尔的服饰”。是的，比起温州皮鞋和义乌小商品，那时的杉杉、雅戈尔不知要高出多少档次。要知道，阿拉宁波人可是的的刮刮的“红帮裁缝”的传人，连“国父”孙中山的“中山装”都是阿拉定做的……

3、关于宁波沦为浙江“老二”现状，市委书记郑栅洁似乎有些“着急”。是呵，这么好的“深水良港”地域优势，这么好的“乡镇、民营经济”，又有着数十万在海内外经营、功成名就的“宁波帮”、“帮宁波”；宁波的经济GDP咋会落后于杭州呢？在经过一番调查研究后，他在市级干部会议上吹响了宁波向着高质量发展的“集结号”：提出：“项目争速、产业争先、科技争投、城乡争优、服务争效、党建争强”暨“六争攻坚、三年攀高”的发展战略。有评论说：“郑书记的‘六争’，旨在把一些‘小富即安’的宁波人从睡梦中拽起。”

这是宁波在新时期发展道路上一个新契机，市委领导向我们每个“小富即安、有心理优势”的市民，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。即宁波的发展依靠什么？

无独有偶，笔者最近看到“知乎”上一篇网文：“为什么宁波的发展会比杭州慢？”提出在五个计划单列市省份里面：

广东：深圳明显强于广州；

福建：厦门明显强于福州；

山东：青岛明显强于济南；

辽宁：大连明显强于沈阳；

唯有浙江，同是计划单列市的宁波，发展远远落后于杭州呢？

作者似乎是一个在宁波创业的外地人，看问题比较片面，话也讲得比较“尖刻”：类似：宁波城市执掌者“没有抓住时代的先机”(那是指小平同志题词：“把全世界的宁波帮动员起来建设宁波”后，国务院专门成立了由国务委员谷牧同志任组长的“宁波经济开发协调小组，宁波先后成为沿海开放城市、副省级城市、后又成为全国第十个计划单列市)。宁波以制造业为代表的乡镇、民营企业“在

弯道竞争中的迷失”（在世纪之交起，宁波的经济显示危机征兆，“制造业”的车夫们不堪称重负；把办厂的收益转投房地产，没如杭州、深圳一般催生出一批行业领军企业。“**城市建设和文化设施相对滞后**”（由于后续政策左右摇摆，城市东移战略搁置下来，曾号称“浙东第一街”的繁华中山路，修修补补经历“八年抗战”仍不理想，整个城市商业业态七零八落；虽有重视教育深厚传统，本土高等教育机构并不理想，与同类城市相比，高等教育和研究力量薄弱的短板明显）。

“城市发展定位布局思维混乱，缺乏像杭州王国平那般的城市管理者”（一个曾经美丽的海滨城市，因为重化工基地的定位，造成沿海化工企业密集，东至北仑、镇海，南至宁海、象山；北至余姚、每地都建有规模巨大的电厂，有多少宁波人可曾想到人口只有北京三分之一的宁波，每年用煤量比之高出一倍，对周围海洋环境影响巨大，成为东南沿海重点雾霾城市。而杭州的发展，牢牢抓住了“弯道超越”的机遇，重点在新经济构建、传统产业升级和市镇建设上。

但这些尖锐的说法，有一点是说到点子上的。这就是经过改革开放漫长的四十年的竞争，现今的宁波人有些疲惫、甚至“麻木”了，对新事物的接受不如三十几年前这般“敏锐”或说“敏感”了。当年创业的许多乡镇、民营企业家，普遍地面临“退居二线”或已经“交班”于新一代了。而“新一代接班人”中，有许多“高智商”而缺乏社会磨练的“新人”。这就使这支队伍缺乏前辈企业家“活蹦乱跳”和“破釜沉舟”的“竞争”精神。

4、本人不想就事论事地评述两个城市间的差距，虽然我在退休前差不多有近一半时间唱“双城记”，至今定居宁波，却还领着省级新闻单位的退休工资。就目前态势看，两个相距不足两百公里的江南名城，无论从经济和文化上，差距显然已经拉开。但我想说的并不是两城人皆看重的经济GDP，而被我们通常相对忽视的文化（City spirit）。这也许更适合我这般从事作家、记者职业身份和嗜好。记得十年前，我被邀择写宁波船舶史展览前言，内有一段“宁波是一艘驶向未来的船，而我们都是船上的一条桨。”被当时在任的王辉忠书记引入他做的《工作报告》中。为何？因为他知道城市的历史是靠每个市民抒写的；政府的职能是组织大家划桨，把劲往一处使，力往一处用；齐心合力才能使城市发展。

我们这代人有幸的是，经历了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全过程。宁波在改革开放前二十年，地域经济发展的速度举世瞩目。站在现在的角度看，除了经济上超常规的发展，还有的是人在精神上的飞跃；这种飞跃几乎溶化在那时宁波城乡还尚清新的空气中。尤其在农村，几乎是家家户户都在希冀着发财。宁波人有一个传统，见面互相问候彼此最关心的问题。如果在五十年前，大家见面都问候：“吃了吗？”因为那时人们吃不饱，最关心的是人的肚皮；但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，人们见面

就问：“发了吗？”换一种口气就是“有钱了吗”？就是这么赤裸裸不避讳。有什么值得避讳的？古代宁波上接京杭南北大运河，下通“海丝之路”直达西洋；是世界唯一“由运河连接海丝之路的枢纽城市，同时也是我国最早孕育现代市民的商贸城市。食色性也，人之常情；没有什么好意思与不好意思的，追求幸福的生活，是正常人性和常情。宁波城市缺乏“商性”不是在百年前，君不知“走遍天下，不如宁波江夏”吗？那不是江夏的风景有多美，而是商业流通必需的“钱庄业”（银行）多如牛毛。“天下有银为十，江夏独占其三”，那又是何等的豪迈和气派。拿今天的话说，那就是 GDP 独占鳌头啰！

现代宁波的相对“停顿”和“滞后”，倒是在上世纪五、六十年代，因为建国后地处“海防前线”、没有重工业投资建设；况地域农业环境呈现“七山二水一分田”，向有“大海洋洋、忘记爹娘”外出做生意的宁波人，在那时候几乎“蹩”坏了。一旦大地回春，政府不再“割资本主义尾巴”，又造“大码头”又允许“做生意”，就连身上的每个毛孔都是畅开的。这种全社会的创业热情，恰恰是当年有“六朝古都范儿”的杭州人所不具备的。他们中的许多“优秀分子”，仍热衷于国企深化“改革”或者伺机承包“国有”或“集体”项目，思忖着更加“合理合法”地比别人多赚一份钱。完全没去想运用政策优势“独立创业”，去掘得人生的“第一桶金”，把宁波人“张牙舞爪”、“一头栽到黑”赚钱称作“二”。

就文化角度说，杭州人似乎比宁波人更追求生活的整体享受，不如宁波人吃苦耐劳和那种看准目标不回头、嗜“赌”成性的“拼命三郎”精神。自然，那时还没有马云。“高考落第”的他在省文联、作协的一家刊物当“临时工”，理智地猛攻数学准备复考。冯根生还在国营药厂打工，“娃哈哈”则是一家校办企业。鲁冠球算是最先与体制决裂的农民企业家，但他也是肖山的一家乡镇企业的“代表”。而这时宁波，“杉杉”、“雅戈尔”、“中国金轮”等等“特大型民企”，已在行业内“称霸一方、独占鳌头”……

5、你说宁波人“二”吗？是有点“二”。“二”在杭州话里，有一种独特的表示：即“不适宜地蛮干”；用普通话表达，大概就是“二愣子”。这当然是一种蔑视或鄙夷的称呼，但对当时急着“富起来”的宁波人来说，倒是妥当的。没有那种“敢为天下人先”的精神气儿，宁波的经济、文化能发展成今天的局面吗？尽管我们相比杭州屈居“其二”，可是我们与自己比较一下，这四十年里我们的城市和农村面貌发生了多大的变化？我们与杭州相差的仅仅是人均 GDP 那条“杠儿”；这条杠，你看重就是“杠”，不看重其实不是“杠”。我国生产总量是除美国外的“全球第二经济实体”；但科技发展、社会保障设施和文明程度，能与西方一流的“老牌资本主义”国家比吗？

2004年，我受慈溪市委宣传部和文联之邀，采访几十个乡镇、民营企业的董事长和总经理，深为他们“走遍千山万水、叩响千家万户、说尽千言万语”、“百折不回、敢为天下人先”的创业精神感动。现今方太集团（原飞翔）董事长茅理翔，当年生产只有微利的“打火枪”，为使产品走向全国、走出国门；他身背产品“闯广交会”，不顾“老总”脸面，几次被人驱赶几次强行“冲入”；自带产品“跑供销”，在零下十几度的雪夜车子“抛锚”被冻成“冰棍”，绝望之中只有一个信念，他说：“为农民的尊严活着，是我唯一生存的勇气。”因为，出生农村拥有“普师”文化程度的他，毕业后双脚瘫痪历经人间艰辛，为了使自已站起来“活成个人样”，他什么苦都尝尽了……

这就是当初浙东农村“在烈焰中炙烤三次，又在海水里浸泡九遍”的第一代农民企业家，他们或多或少都有像茅理翔这般的经历，是时代的大潮把他们推到了改革开放的前沿。当年的中共慈溪市委书记徐明夫，把慈溪农民这种精神，归纳为本地“移民文化”、“青瓷文化”和“海塘文化”影响的结果。说改革开放慈溪发出速度惊人，除了党的政策外，地域文化发挥了很大的作用。

我与另一位作者把慈溪人这种“敢为天下先”的精神，写成一本题为《时代见证——慈溪农民报告》的书，献给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诞辰100周年，在文坛受到好评。遗憾的是：不是每一任领导都是这样看问题的，认为慈溪之所以能在改革开放前二十年取得骄人成绩，是因为政府政策引导得力。当时有一位省级机关下来锻炼的孙姓副书记，在这本书的研讨会上大谈政府的“执行力”，在研讨会结束邀请总后创作室一位作家（我在北师大读研的同学），另择写关于“政府在改革开放中提升执行力”的长篇报告文学。旧事重提，不是为我的作品没获得重点奖项叫屈；而是地域文化中“平民史观”还是“英雄史观”的抉择。在宁波的改革开放中，是政府官员“唱主角”，还是由企业家“唱主角”？也就是谁率先品尝“改革鲜果”的大问题。

6、为此，我斗胆在这儿提出“庶民文化”与“士族文化”的概念，这是现代城市发展中凭借经济条件却又截然不同、相互依赖又相互抵触的城市文化内涵。譬如说杭州作为世界旅游城市推出的“杭帮菜”，源于南宋建都苟安“西湖歌舞何时休”的“瓦舍”，“瓦舍”是干什么的？简言之就是现在的卡拉OK兼餐厅的歌舞厅（也可叫戏台子），达官贵人嬉戏于内就餐，于是“杭帮菜”就出来了。本世纪初我从事旅游报业工作时涉及过菜肴的“改革”（也就是推出一种菜系），知道“杭帮菜”分“城厢”、“湖墅”两种。现在推出的基本上是“湖墅”菜系，因为“城厢”菜系太繁琐，不适合现代“大众旅游”。

那么“甬帮菜”呢？真正的“甬帮菜”是什么？其实也与旅游有关系，大都

是以咸、鲜为主、原汁原味、清蒸白煮；过去月湖船娘载游客载波以舟，以“六冷、八冷、十二会签”待客，谓之“月湖船菜”或“三江煮菜”。不管你如何变化？“甬帮菜”相比“杭帮菜”，无论色香、口味、品相与知名度，远不如“杭帮菜”。究其原因，就和城市在历史上的知名度和文化内涵相关。

一个城市的成长和发展，离不开自身文化制肘的历史。即使美国纽约、华盛顿这般建城不足三百年的“暴发户”，也有属于自己的文化史。杭州与宁波同属江南富庶之乡的“水城”，在中国漫长的农耕文明史上，杭州无非由于耕田比宁波富有一些，且不受海潮侵扰、自然条件稍优于宁波。一条南北大运河的贯通，使杭州、宁波在历史上受益非浅，尤其是宁波，自汉晋以降成为中华帝国通往世界的“黄金水道”出海口、“海上丝路”的启碇港。但是，杭州的受益主要是南宋在此建都一百三十余年，形成当时世界上最为繁华的“士族文化”，相比中国最早产生“庶民文化”的宁波。这种“士族文化”，似乎更接我国从“农耕文明”走向“工业文明”、从“计划经济”走向“市场经济”的“地气”。

一个城市的经济发展，短期内可以不受文化基础的制约，但从长远的眼光看，必与城市自身的文化基础相关。杭州近二十年的“咸鱼”翻身史，我们可以从“知乎”上《十年一觉杭州网》中觅得端倪。那里面政府与企业、官员与企业家、中央与地方，讲得更多的不是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开放，而是一种“权谋”和“文化”。我想：如果你是一个有一定专业经济与文化知识的杭州人宁波人，一定能看懂什么是政治家执掌城市，而不是经济学家或企业家……

7、现在我讲最后一个问题，那就是宁波在今后十年的发展中，是不是甘居浙江“老二”，还是超越杭州成为浙江“老大”？

此问题其实很不好回答，应该也不是我这般的“闲散百姓”能回答的；郑栅洁书记的“六争攻坚、三年攀高”的发展战略，应是一个对党和人民、特别是对宁波负责任的好干部站在历史的高度，对宁波“对症下药”提出的口号，经过一年的实践，应该说卓有成效。遗憾的是各级政府在执行郑书记指示的过程中，往往突出了在物质层面的“六争”，而很少有人注意在精神层面上的“六争”。

这话如何理解呢？就历史角度看，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宁波向中央、海内外招商争的项目并不算少；那“泱泱东方大港”的北仑码头，是争来的，镇海、北仑连片的化工城、热电厂，也是争来的，世界上最长的跨海大桥，还是争来的；农村城镇化、那么多的“拆迁”项目、遍地发展旅游的民宿，那么多接受政府资助的科技“信息”、文化产业项目，同样是争来的；但你还是没有宁波的一个“阿里巴巴”，好不容易出了一个丁磊，人家先跑到深圳“创业”，后来又跑到杭州“养猪”了；再看看上世纪八、九十年代风云一时的乡镇民营企业，“杉杉”跑到上

海去了，“雅戈尔”沦落为房地产业了，支柱慈溪财政“钱袋子”的“中国金轮”消失已久……当然，还有“方太”、还有“金田铜业”、还有“华茂”、“海天”……只是多者乎不多也。乡镇、民营企业的“黄金时代”已经过去，这有时代的原因，企业自身的原因；也有政府支持力度与引导的原因。如果询问那些倒毙或搬迁至异地的企业家，他们怀念的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中期，说那段时期是宁波乡镇、民营经济发展的最佳良机。前段时期我在上海还听当地的商会的“老板”谈及：“若论政府支持的力度，当推上世纪 90 中期。其重要一点，是把企业流动的资金盘转活了，使企业如鱼得水……”

我不懂企业管理，不知这说法对还是不对。查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当是铁面朱总理整顿金融秩序时，宁波当时头面人物许、谢也正因为此丢掉官帽、囹圄入狱……为何那段时期宁波的经济 GDP 反倒快了？以后速度慢慢地缓下来。就我眼光看，主要还是地域文化因素。信奉老子“上善若水”的宁波人，在生意场上“弹出眼乌珠”竞争，颇有一种“敢为天下人先”的硬劲和“杀胚”闯劲。在精神领域中却非常善良，信奉老子：“上善若水，水利万物而不争”道理；“小富即安”也好，“与人为善”也罢，如果政府没出台切实可行“文化兴市”的措施，提出类似物质领域“六争”之类的口号，已经适应在精神上“安逸”和处于“休憩”状态下的宁波“新生代”市民阶层（以“富二代”和“官二代”为主体），是不会主动“轻举妄动”参与时代竞争的。因为对普通人来说，生命有限而奋斗无涯；“挖第一桶金”的时代已经过去，“与人为善”就要“小富即安”，这是以市民为主体的现代城市的“个性”特色。一个城市有没有竞争性？或者说有没有持久性的竞争力，关键不在于物质上拥有或说“竞争”；而在于精神上以“不争”为特色的“心理竞争”和“心理优势”。就如以前上海人除了宁波来人称之外婆家的“银客”；而其他城市不管北京、天津、广州，则一概统统地称为“北佬”、“南蛮”和“乡下人”。这就是蕴藏在近代市民阶层心中的“潜意识”。

老子所说：“上善若水，水利万物而不争。”所谓“不争”，其实是最大的争。你看那滔滔东逝之水，逢山开路，水滴石穿，一刻不停地汇入海洋，哪有什么“万里长江水，我取一瓢饮”的退让？争者乎，非争也。如果你拥有“水滴石穿”、“水润万物”的精神，这浙江“老大”的桂冠，最后还会落到你头上。这些，供深谙“庶民文化”之道的宁波企业家和市民共同思考之。

所以我说：“为拥有杭州半座房，而丢掉宁波一套屋者，谬也！”